

抗天灾 抵侵略 修机场

——揭秘抗战时期的中国童子军

□崔燃

1930年4月，第一次全国童子军总检阅和大露营在南京举行。参加这次集会的有121个团，3366名童子军。这一年，中国的童子军人数已经超过15万。

1912年2月25日，湖北武昌人严家麟参考英美童子军的教育形式，组织60个16岁以下的男孩，在武昌文华书院图书馆宣誓。

1935年，四川的童子军训练达到了高峰，在随后的10多年时间里，这些少年们抗天灾、抵侵略，和成人一样战斗着，是一支真正的部队。

童子军建制以抗倭名将为名

《南充地区教育志》记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川中小学实行童子军训练，南充各初级中学和高级小学陆续建立童子军组织。

8~11岁为幼童军，12~18岁为童子军，18岁以上为青年童子军。全区以学校为单位建立童子军团，校长兼团长，设副团长、教练员、传令员、文书等职。团以下以班为单位设中队，班长、副班长兼任正、副中队长；班以下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设小队，小组长兼任小队长。每个中队均有队旗，旗帜上标有中队番号。中队下各小队以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花木兰、秋瑾等历史名人命名。

从一些老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童子军有样式基本统一的黄色斜纹布制服，平时穿草



虽是“军人”，却一脸童真。

绿色的童子军服(女生下着裙装)，戴童子军领巾，腰束铸有童子军军徽的铜扣皮带。

童子军军帽有多种样式，男生一般都是大盖帽和船形帽，女生则是大盖帽和圆顶帽。

在锦江区档案局的档案中记者发现，当时四川童子军的军礼沿用了国际通用的三指军礼，手势是举起右手的三根指头，食指接触帽檐，即“三指”军礼。

天灾人祸时 募集衣物济灾民

1930年至1937年，四川自然灾害频发。即使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四川人民仍顽强地与天灾人祸抗争着。在锦江区档案局(馆)的“民国”珍贵史料中，记录了一些属于动荡年代里“童子军”



当年，童子军队伍声势浩大。

们的见证。

1936年，川甘大饥荒进入高潮阶段，就四川而言，除成都各县外都是灾区。本为鱼米之乡的四川其重灾区已有多片土地颗粒无收。

此时的国家正处于抗战初期，政府在军用债务的重压下无暇顾及天灾。全国童子军总会，则在后方积极组织动员，锦江区档案局一篇档案中写道：“成都市政府要求童子军应做到：1. 尽力捐施；节省零用筹备余钱；2.募集现金；向亲属朋友及社会人士募捐；3.募集用品：募集衣服、粮食、用具、药品。”对于灾区童子军，“自卫以外协助军警河工筑堤抢险、担任救护工作以及救济灾民赠衣施食并设法收容居住。”

在档案中还可以发现，四川童子军训练的主要内容包括纪律、礼节、操法、结绳、旗语、侦察、

救护、炊事、露营等。军事技术训练是在专门的军训教官指导下进行的。每个童子军团都有固定的军训教官1~3人，由当局从军队中抽派，每年轮换一次。军事技术训练结束后，各童子军团要分别举行会操表演和野营拉练，而一些学校拉练的地点甚至就在如今东风大桥附近，当时那里还是成都的郊外。学生们在拉练中迅速掌握了急救知识，在1936年的救灾府要求童子军应做到：1. 尽力捐施；节省零用筹备余钱；2.募集现金；向亲属朋友及社会人士募捐；3.募集用品：募集衣服、粮食、用具、药品。”对于灾区童子军，“自卫以外协助军警河工筑堤抢险、担任救护工作以及救济灾民赠衣施食并设法收容居住。”

支援抗日 留下诸多感人故事

在锦江区档案馆的一份档案中，记录了成都实验小学当年的

战时服务训练办法：“训练程序，第一月：救护，防空，防毒；第二月：消防，通讯，交通；第三月：警备，救济难民，劝募。”艰苦训练的目的在于：“协助维持后方秩序，保障群众安全，争取最后胜利。”

在档案中，这些童子军还为名人演讲担任过护卫。在少城公园，他们参加名人演讲，分小组研究、最后实践。这些10多岁的孩子，为浴火奋战的抗日战士们募集物资，也为远离家乡的川军们解除了后顾之忧。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川军出川抗日，四川省政府训令：省立成都实验小学“非年满十六岁，不得参加一切非常工作”。未满16岁的孩子自发在田间劳作、在广场演讲，用实际行动呼吁人民不做亡国奴。甚至在成都附近修建的各个机场都能发现童子军，他们利用假期来帮忙，搬石头、砌卵石，这些机场起飞的飞机加速了抗战的胜利。

在另一份档案中，记者还发现了童子军四川省分会发布的棉背心的缝制方法，动员大家动手缝衣。一些童子军利用课余时间与成人一起募捐，在一个假期中，四川童子军200人与部分老师一起劳动，共捐款1510元，这些钱相当于现在6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

抗战时期，童子军组织遭到日伪严重破坏。1937年9月，日本占领北平后，即明令布告取消中国童子军组织。南京沦陷后，童子军总会所在地亦被日军改为神社。抗战胜利后，中国童子军才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其规模再也未曾达到抗战前的水平。

古代“高考”也严格

清朝有准考证 唐伯虎因“作弊”入狱

□姚媛媛

每年的高考为了防止作弊，管理非常严格，现代高考更是为了防止层出不穷的“高科技”作弊手段，而进行了极其严格的把控。其实高考作弊在古代也存在，古代高考为了防止考生作弊，也是如此大敌。

贡院考生“装备”大全

根据南京地方志资料显示，古代高考的考生们有“标准装备”：手提灯笼、书箱、食品等，胸前挂着一个卷袋，用来放置试卷笔墨。卷袋一般是用蓝布制成。

档案显示，古代考生“装备”也大有讲究。秦淮区文化局局长赵久明告诉记者，即将建成的科举博物馆内的展品除了有科举书籍、试卷等等以外，还有大量考生的装备。

考生考试一共有四场，开考前一天下午，考生必须静卧休息，等到夜晚三更的时候，考场放头炮，店主或者家人就叫考生起床，然后梳洗吃饭，到了四更考场放二炮，考生就出发，到考场外面等候。等到考场放三炮，主考就坐，开始点名，这时候考生就鱼贯入内，领取卷子各自进各自的号舍，

核心提示：

五更开始出题，考生看题后开始答卷，一直要答到黄昏时候才放头牌，就是第一次放出考生，然后考场又关闭。到了吃晚饭时，放二牌，半夜时放三牌。三牌之后考场的门就不再关了，这时候没有答完卷子的考生已经寥寥无几。

考场清场封门。

五更开始出题，考生看题后开始答卷，一直要答到黄昏时候才放头牌，就是第一次放出考生，然后考场又关闭。到了吃晚饭时，放二牌，半夜时放三牌。三牌之后考场的门就不再关了，这时候没有答完卷子的考生已经寥寥无几。

唐伯虎曾在贡院“作弊”？

著名才子唐伯虎在南京的江南贡院还曾经发生过一段“作弊冤案”。据说，唐伯虎在1498年，在



唐朝科举

南京夫子庙的贡院参加乡试，考取第一名，为应天府解元。等到赴京再考的时候，却被诬陷受贿买题而蒙冤下狱。事实情况是：当唐伯虎考取解元之后，江阴有个巨富姓徐，与唐伯虎在京参加同科会试。徐行贿主考官程敏政的家童，窃取了试题，他曾经拿着试题问唐伯虎是否愿意看，唐伯虎自信能考取，就拒绝了。但是，后来有人揭露了徐的作弊行为，同时牵连到唐伯虎，唐伯虎也入狱了，从此他就心灰意冷。后来，真相大白了，唐伯虎被安排到浙江当个小官，唐伯虎不肯去，回家过起了浪子的生活。

这其实也是一段关于科考作弊的历史。

清朝考场出现了“准考证”

为了防止考生作弊，古代考场会实行糊名制和誊录制，把考生姓名封住，考卷也派八百多个用人用红笔重新誊抄，这就叫“朱卷”，原先考生自己写的叫“墨卷”。这是为了防止考生买通考官，这样考官就不能认出考生的笔迹了。明清的科举“安检”十分严格，要求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

县处级以上干部过去都学些啥

□新华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对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出安排。

在中共的历史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集中学习并不少，也涉及很多方面。那么，领导干部的集中学习都有哪些内容？涉及哪些方面？

学政经：让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

毛泽东第一次提倡县处级以上

上千部学政治经济学，是在“大跃进”发动半年后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上。

这次会议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开了9天。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初步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从11月8日到10日，毛泽东亲自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这本书，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随后，中央通报会议精神，组

织县处级以上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学历史：研究历史才能“理论起来”

刘少奇曾说，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也曾号召全国所有县处级以上干部一定要学好历史。

1948年12月14日，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并号召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都要系统学习历史。他说，要想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要学习和了解历史，包括学习和了解西方历史，只有了解了西方历史才

能读懂马列主义，因为“马恩列斯的书籍中，论中国的不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讲的外国事，写的外国材料，分析的外国历史”。他指出，“例如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就是研究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苏维埃制度的经验而提出的”。既要懂中国历史，又要懂世界历史，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段时间，很多干部都把《世界通史》作为枕边书，甚至每天都不离手。

学“四性”：工作再忙也一定要学

邓小平在担任中组部部长长期

间，成立了“干部训练处”这一专门机构，先后组织了万余名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理论学习。

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我们还是要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学习理论的空气。”

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更是提出县处级以上干部都要学习“四性”。他说道，“干部们虽然工作繁忙，但这‘四性’一定要学、要培养。”

这“四性”是指，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

天儿太热！古人如何祛暑纳凉

□重晚

凉屋 巧妙利用地理优势

唐代出现了一种供人消暑的“凉屋”。“凉屋”通常傍水而建，采用类似火车的方式推动扇轮运转，将凉气徐徐送入屋中，或者利用机械将水送至屋顶，然后沿檐而下，制成“人工水帘”，屋里里自然会凉快起来。

到了明代，“凉屋”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朝文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对此有精彩描述：“霍则别墅，一堂之中开七井，皆以钹刻之，盘覆之，夏日坐其上，七井生凉，不知暑气。”不难看出，明代人已知在消暑时巧妙利用地理优势，掘井纳凉，天然环保，不乏科学道理。

冷饮 冬日蓄冰贮藏以备盛夏消暑

大约在三千年前的商代，富贵人家就已经开始在冬日凿冰贮藏于

窖，以备来年盛夏消暑之需。周朝设有专掌“冰权”的“凌人”。西周时期，“凌人”更上升为朝廷中的一个职位，从职者专门负责冷饮的制作，这足以说明当时冷饮之珍贵。

到了宋代，冷饮有了新的突破。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对一种叫“冰酪”的冷饮大加赞赏：“似赋还成爽，才凝又欲飘；玉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马可·波罗来中国时，受元世祖赏赐，幸福地品尝到了当时的皇家冷饮“冰酪”。

瓷枕 枕面一层釉 冰冰凉凉的

除了上述方法，古人还有别的度夏高招。中国自古被称为“瓷器王国”，古人除了会用瓷器做碗、做花瓶外，还发明了瓷枕。瓷枕的枕面是一层釉，冰冰凉凉的，夏天枕于其上，睡起来当然凉快。所谓“半窗千里月，一枕五更风”，恐怕就是古人对瓷枕的热情讴歌。古代的夏天同样有蚊虫，有人别出心裁挂上香囊，让香囊中的药材帮忙驱赶蚊虫，堪称不用燃烧的环保蚊香。

古代医师也懂心理疗法——

利用人的羞耻感治疗疾病

□祁凯琳

利用心理疗法治病，不只现代

人懂，古代医师也常施用。

清代的《续名医类案》中，就记载了这么一起真实病例。当时，有名因眩晕而卧病不起的妇女，来求名医傅青诊治。结果，傅青开出的药方是“软石汤”。病妇丈夫按傅青的吩咐，要将石头煮软，让妻服下。

哪知，煮了几天几夜，石头坚硬如初。这几天里，病患的丈夫渴了，就喝点水；饿了，随便塞点干粮；困了，就眯着眼小睡片刻。几天下来，整个人都脱了形，邋邋不堪。病者见状，大受感动，挣扎着起身，和丈夫一起煮石头。

直至此时，傅青才道出原委。病患眩晕，是因为心中的郁怒所致。要令其能起床，就得化解郁怒。爱是驱散郁怒的良药，于是傅青故意开出“软石汤”，让其夫展现出情比金坚的一面，感动了妻子，心中的郁怒自

然驱散。这么一来，病就不药而愈了。

若说这起病例，是利用正面的心理力量，那另一起，则是从反面为之。

《伤科汇纂》中，记载了这么一个病例。有名女子，腿骨脱臼，找大夫诊治。大夫匆匆将牵引端固定后，就借故离开。女子大腿外露，又羞又臊，拼命往里缩。结果，这么一用力，腿骨因此而复位，恢复了正常。

在后一起病例中，大夫利用的是患者的羞耻感。通过令其产生羞耻感，进而下意识地反抗与挣扎，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患者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受心理因素的影响，通过习惯性的行为方式，一步步跟着大夫的设想来走，结果就不药而愈了。

可见，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的心理力量，只要利用得当，都是治病的良方。

掌故

空手套白狼 古今意不同

“空手套白狼”在今天是一个贬义词，比喻那些不做任何投资到处行骗的骗子所用的欺骗手段。

然而，在中国古代，白狼是一种祥瑞的动物，它的出现往往和圣人、和改朝换代联系在一起。《帝王世纪》记载：“汤得天下，有神獬、白狼衔钩入殿朝。”孟子说五百年必有圣人出，因此当商朝取代夏朝的时候，祥瑞的白狼就出现了，预示着商朝替换夏朝统治天下。唐朝编成的《艺文类聚》解释白狼说：“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则见。”就是说白狼只会出现

在国君具备仁德的时代，乱世是绝不会出现。的。《山海经》的作者郭璞也称颂白狼唯有道德的人才能见到，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吉祥动物，不是随便便就出现在人间的。

可见白狼是祥瑞的征兆。“空手套白狼”因此也就成为一句褒奖之语，褒奖那些能够空手把象征祥瑞的白狼套住的有道国君和勇士。如今，这一俗语居然成了一个贬义词，成了骗子实施诈骗手段的同义词，真是令人浩叹！

(摘自《北京晚报》)

信封起源于秦汉



秦汉时代的信封

信封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当时，为保护刻写在木板和竹简上的书信完整无损，就用两块刻

成鲤鱼形的木板，夹在文书简牍的外面。木板上还刻有3道线槽，用绳捆住并封上黏土、加盖印章，以防私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信封。魏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书信材料逐渐由木质演化为纸质。

世界上最早的纸信封是英国发明的。1820年，商人布鲁尔发现很多女士喜欢写信但又怕人偷看。他灵机一动设计了信封，没想到竟得到英国当局承认。(摘自《文史天地》)

元代就开始“按揭”

个人购置商品房抵押贷款的“按揭”一词，一般认为是个“舶来品”。其实，“抵押借贷”在中国古已有之。

古语“借”通“揭”，“揭债”在元代就已通行。元代柯丹邱的《荆钗记》剧本有“钱难揭债，物无借贷”的唱词，且“揭债”与“借贷”不同，这极

可能说明，“揭债”是有抵押的借贷之专用名词。到明代，抵押借贷已很普遍。《详刑公案》明确记载生意人之间“借揭几两”白银，然后“按月加利奉还”，这比上世纪90年代在地产经济中崭露头角的“按揭”早了四五百年。

(摘自《北京晨报》)